

大众文化的出场和兴盛

——评徐国源新著《典范转移 中国大众文化的出场视域》

李开玲

(盐城工学院学报编辑部,江苏盐城 224051)

摘要:作为大众文化“出场”研究的专著,从“现代性”、“都市”、“大众”等问题的历史审视切入,勾勒中国“后现代”文化空间的表征,科学阐释“大众文化”的意义,显示了作者的学术阐释力和独到的学术眼光;充溢全书的对话意识使读者倍感亲切,一扫阅读理论著作时常有的晦涩,使艰难的理论回溯与哲理思辨成为读者的一次并不沉重的思想旅行。

关键词:大众文化;现代化;后现代;媒介;典范转移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1)02-0060-04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大众文化发展迅猛,它藉由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后现代转向”、“社会结构转型”和“全球化”等途径,全面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于九十年代中期一跃而为文艺学、传播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学科的“显学”。大众文化的出场(“出场”一词源于舞台表演艺术,其哲学阐释为:摆脱被遮蔽状态进入某个特定场域中的行动)是文化史的一次重大转折,它并非“孤立”、“自足”的文化现象,它是这个时代的经济形态、哲学观念、主体心理结构、生活方式等整体性转型的综合显现,可视为“文化范式”的革命或转型。虽然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学术兴趣转移到了文化研究,大众文化研究成果也日渐丰富,但相关大众文化有实质意义的激烈论争在各研究领域极少,这种境况与学界浮躁的治学心态相关,也折射出大众文化的爆炸式呈现留给人们思考的时间太少,产生的“疑难”太多。

针对当前大众文化研究一窝蜂地只停留在对西方文化理论的“话语移植”和对大众文化“现象批评”这些浮泛层面上的现状,徐国源先生的学术新著《典范转移 中国大众文化的出场视域》(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作者徐国源系江苏宜兴人,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传媒与大众文化、新闻理论与实务)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获得学

术研究的方向感,结合“全球化”思潮,梳理大众文化的理论资源,把握文化嬗变的契机,追踪文化衍变的轨辙,考察大众文化在中国出场和兴起的外部环境、内在理路及其内外交织的状况,有说服力地回答了“如何界定大众文化才是科学的,大众文化有什么严格的时间、空间和内涵的限定”、“大众文化形成了怎样的文化表征,出现了怎样的‘文化范式’转移”、“大众传媒在当代文化的‘激变’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高雅文化的关系”等理论与实践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发人深思。

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是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俞可平认为,“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交织与重合,是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一把钥匙,文化转型也不例外”,^[1]恰当地指出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文化转型的关键所在。徐国源先生的大众文化讨论从“现代化”开始,把“现代性”看作是大众文化出场唱历史大戏的楔子,这是全书的一个亮点,有利于把“文化典范的转移”等问题说清说透;如作者所言:撇开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奢谈文化转型是只看到了“果”,而忽略了隐藏其后的巨大的“因”,如果没有30多年的社会现代化和观念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大众文化就没有深广的历史和现实背景。”^[2]³⁶亨廷顿

收稿日期:2011-03-09

作者简介:李开玲(1957-),女,江苏扬州人,副教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高等教育。

在他的《变化中的社会秩序》中指出,“现代化的尺度是由城市的发展来衡量的”^[3],城市印证了文明进化的轨辙,城市作为文化的结构体存在于城市文本的表述中,这就为理解现代化与城市发展提供了依据。在“都市:作为文化背景”章,徐先生巧妙地藉由“上海摩登”把“都市”与“现代”接连了起来,顺应了中国人的日常想像:“都市”的就是“摩登”的;“摩登”的就是“现代”的。上海作为重要的通商口岸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具备了工业文明成熟期的特征,上海人也很快实现了从“乡民”到“市民”的“都市化”转变。在这个“转变”中,大众化的艺术样式(如画报、小说、电影和曲艺等)以市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有效地灌输了现代意识,这些艺术样式是立足民间又关乎民间的一种城市表述,是关于民间的城市和自我的表述,它们符号化了现代都市和大众的生活。而在大众看来只有这样的现代都市经验的表述才具有“现代性”,弗里斯比曾明确说明:“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就是人们感觉到处在一种永无休止的变动中”,^[4]因而,擅长于表现都市生活纷繁和变动不居,惯用人性安顿人心,安慰大众对世俗幸福生活渴求的上述读物,虽较少有深度但却“好看”,它们已然成为一种向中下层社会全面开放的文化,并从多方面改变和塑形着中下层社会,呼应了年轻群体的城市想像。按照表述者的社会身份谱系划分,城市想像主要分文人式和市民式。文人作家和知识分子对于城市的表述具有整体化、中心化和逻辑化的总体特征,都市大众文化则通常“形而下”地按照“跟着感觉走”的经验范式形成了另一套城市叙述。大众化的城市叙述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介崛起以后,逐渐上升为日常性、主流性的表述,文学性的城市表述则退位为“小众”的、贵族化的表达。在“都市:想像与表述”一节中,徐先生从对“想像”、“想像性”这两个概念的阐释切入,谈及“城市表述”问题,又回环到“现代性”问题,这是作者对大众文化形成的基础性追问,显示了作者非常清晰的逻辑思路以及“坚持话要从头说起”的踏实的治学心态。“想像”这一概念不等同于虚假意识,不是单纯的都市生活经验,是必须经由经验到文本的过程,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城市表述,是对某一城市的一种公共想像,非个体性的。在关于“现代化”、“都市”以及“都市想像”的论述中,大众文化的修饰语“大众”的面目逐渐清晰起来,文章沿此追溯,总

结出三个“分离”:作为文化的修饰语的“大众”从组织体系中分离,获得了个体自由身份;从精英/大众的传统二元结构中分离,获得了平等对话的身份;在现代性议程中,从传统乡村文明生态中分离,获得了都市大众的现代身份,逐渐自立门户,建构起具有自身独特表述的主体身份谱系,成为文化创造的主体之一极,并介入到当代公共文化空间,与精英文化、主导文化一起塑造未来的文化。

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从传统到现代,对现代化过程之结果的理论概括就是现代性。“‘现代性’议程与文化重构”章认为1980年后的中国大众文化是在文化的“现代性”追求过程中的一种逻辑展现,至于“后现代”的表征则是在全球性背景下,东西方文化思潮交流拥抱迸溅出的浪花,作者并不全然照搬西方“后现代”理论,而力避泛泛宏论,与中国正在展开的现代进程的大语境紧密相连,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在随后的“现代性在中国”、“中国的现代性转换”等论题中,徐先生又多次强调了中国现代性的特殊问题情境,建议学者深入到历史场景,详加考察现代性转换的前现代背景。自清末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现代与传统对立,告别传统,走向现代,一直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潜意识。把“现代性”的理论资源与对中国“前现代史”的历史场景与细节分析结合起来,是在中国现代性问题上寻找“传统”的一种努力。在初始意义上,“现代”意味着科学、文明、丰裕和民族、身份和尊严等,人们是如此渴望“现代”,但八十年代以前,中国的现代性一直被置于一种想象性、召唤性的图景;从新时期的“反思”开始,“现代性”已经走出了想象性过程演变为一个民族的意识形态。“现代性”议程带来了中国文化复杂而深刻的价值与范式的转换,诸多文化产品中表述的“现代摩登体验”越来越内化为大众的“现代性”精神。于是,人们看到,“现代性”精神越强,“主体”价值的实现程度就越高,“主体”的私人空间也随之切入一个“市民社会”的“公共空间”,引发了当代文化公共空间的裂变,并反过来见证了中国的“现代性”进程。

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自觉自律的“公共空间”的形成,所谓“公共空间”其实是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的中国式表达^[5],它撇开了西方“公民社会”特定的先决条件,是仅限于文化层面的一种表述,有利于探讨中国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文化公共空间形成的问题。“公共

领域”描述了一个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这个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意见”能够生成,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公众^[6]。哈贝马斯非常重视公共领域对于完善现代性的意义,他对在国家干预和传媒干预等因素影响下的公共空间的转型等问题表示担忧。克鲁格后来把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扩展到了公共性的文化领域,包括媒体传播文化和各种消费性文化。九十年代,文学中的“欲望”叙事,引起了消费性文化空间内的广泛争议。因为中国“现代化”的巨大步伐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失衡和危机,在知识界就首先出现了一股反思力量,比如,在作家的笔下,“现代化”沦为描述沉沦欲望的叙事作品的背景,体现了人们对到底要建立什么样的现代化社会的迷茫。时过境迁,由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后现代话语的冲击,以及大众媒介变成了社会发展的直接推动力,中国后现代文化日益风靡,文化公共空间迅速裂变为由大众传播媒介主导的,以“传播—消费”模式为标志的“后现代”文化空间,改变了数千年广为传承的文化经典模式,即以表层的审美幻觉替代有深度的心灵密码,并肆意地对历史典故进行自鸣得意的玩弄^[7]。以上,作者以公共文化空间为中心话语,考察发生在文化场域里的一次重大的转型,准确地勾勒出了中国的“后现代”空间的文化表征,并水到渠成地清晰地阐释了看似纷繁的“大众文化”的本质意义。

“后现代”知识生产论是全书之华彩,暂且不论书中对后现代主义各大家理论的精确概括,单看“请诸葛亮下神坛”、“猫论”等个案的选择,均以感性的方式揭示后现代主义的特性,令人佩服。作者在此,并非单刀直入批评“知识远离真理探求,而被赋予实用和有趣的特性”,而是从理论层面面对后现代代表德里达的“延异”理论及其后现代的文化立场加以阐释,并指出后现代的“延异”论已经在中国被二度阐释为“历史死了”、“作者死了”和“文本死了”等极端口号,所谓“经典”已经被拆卸得面目全非,最终为读者清晰地描述出了后现代及其后现代文化的根本问题:存在于后现代之后的是日益强大而无处不在的资本和资本的逻辑,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包括知识,艺术甚至关于后现代理论本身,都像香水和时装一样只是供人消费的商品而已。后现代文化的根本问题在于它无根底、无节制的所谓“创造”,它漂浮不

定、进退失据,它对传统知识生产“生态”的破坏和包孕着优秀而深刻的人文传统的“经典”的消解,其后果是灾难性的^{[2]151}。

在第四章,作者以“大众文化的人文审视”展开论述。凭借多年的学术积累,以独到的学术眼力梳理出传统的人文性知识生产在“后现代”的境遇中出现的新的机制性症候。作者认为,文化“商品”化过程的隐形结构是文化迎合消费,消费刺激生产,生产促进工业。以传媒为中心的文化工业生产流水线要求文化产品具备高度的“想像力”,“真实”不重要,“想像”才是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动力法则,“注意力”资源才是王道。在当今社会中,“民间”因其散发的原始魅力和保持的天然状态,承载着最为大众化的历史记忆和最具有召唤性的文化想像,迎合了消费市场的需求,成为最具“卖点”的文化符号。作者的笔触在此重返“民间”,既精到、有说服力地突出了“大众文化”的重要历史发展线索,也保证了著作的历史厚重感和可读性、可信性。作者对大众文化发展的各历史“关节点”给予了辩证的扬弃,冷静地对待大众文化的正负面审美价值,强调对“大众文化”的审视应坚持人文立场,张扬其“抒发性情”之长而力避其“撩拨欲望”之短,无疑这更切合于当代审美文化建设。同时以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文关怀和担当解读大众文化的深度构成,为修正其偏差而克尽绵薄,或许正是大众文化研究的目标所在。在当今多元文化的格局中,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倘若能够摒弃“你死我活”的文化对垒,而是在对话、交流和融合中寻找当代文化的生机与出路,那么一种既切合美学的生活意义又能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审美生存态度,就有可能将真正接近人的“诗意的栖居”^{[2]147}。

总之,作者放眼晚清以来的百年历史,饶具才情地按两条线索交叉展开,展示大众文化出场的图示,保证了论证布局的周全和严谨:一是“都市”、“大众”如何藉由“现代性”议程和社会转型,构造出现代“摩登”的文化地图,引出大众文化的炫目登场;二是当代文化如何在传媒体制、消费模式、价值观念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出现了文化“范式”的古今衍变和“典范”转移。在具体论述时,作者着眼于“后现代”的中心场域,即由传媒主导的文化空间,将历史反思和当代审视融为了一体,把“问题”既放在元语境甚至前语境中,也

置放于当下的文化语境里,融合了感性描述、知性分析和理性辩证的研究方法,在理性简洁的行文中尽显畅达的学术思想;同时,充溢全书的发问语调或对话意识又使读者倍感生动亲切,一扫理论

著作阅读时常有的晦涩感,使艰难的理论回溯与思辨变成了读者的一次并不沉重的思想旅行。如是,当读者掩卷深思,大众文化的出场和兴盛便有了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期待。

参考文献:

- [1] 俞可平. 现代化与全球化双重变奏下的中国文化发展[J]. 学术月刊, 2006(4): 14-22.
- [2] 徐国源. 典范转移 中国大众文化的出场视域[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 [3] [美] 塞缪尔·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王冠华译. 上海: 三联书店, 1989: 66.
- [4] [英] 戴维·弗里斯比. 现代性的碎片[M]. 卢辉临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5.
- [5] [美] 李欧梵. 现代性的追求[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0: 3-4.
- [6] [德] 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M]//汪晖, 陈燕谷. 文化与公共性.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125-126.
- [7] [英] 约翰·斯道雷. 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M]. 杨竹山等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264.

Mass Culture's Appearance and Flourish ——Review of Xu GuoYuan's New Book: Paradigm Shift: Mass Culture's Appearance Horizon

LI Kai-lin

(The Journal Editorial Department,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angsu Yancheng 224051, China)

Abstract: As the monograph of mass culture's "appearances" study, it takes "modernity", "metropolis" and "masses" as starting points, drawing the outline of characterizations of Chinese postmodern culture and explaining the significance of "mass culture" scientifically. It has demonstrated author's ability of academic explanation and the original academic judgment. Due to the dialogue consciousness throughout full text, readers feel kindly and the obscure feelings while reading theoretical work are swept. The difficult theory recollection and the speculation becomes a reader's relaxed thought travel.

Keywords: mass culture; modernization; postmodern; medium; paradigm shift

(责任编辑: 李 军; 校对: 洪 林)